

公共新聞：實體與實用的報導

壹、 主題文章一：媒體在社區建設中的作用¹

在從皮尤公民新聞中心 (<http://www.pewcenter.org/>) 成立至今的六年時間裡，公民新聞走過了一條很長的道路。現在我們認識到兩件事情：

1. 如果媒體用不同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工作，那麼公民也會用不同的方式盡公民的職責。
2. 如果在新聞室播撒創新的種子，那麼就會收獲新設想。

在美國今天的社會裡，記者和公眾都在為找到好新聞的定義而努力。如今，記者自認為做好本職工作已經不夠。新聞報導若要繼續得到憲法的保護並繼續吸引讀者和觀眾，那麼就需要讀者和觀眾也都認為，新聞報導在我們的民主社會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但是最近有一些令人深感憂慮的數據顯示，情況並不是這樣。全國範圍的多種民意調查表明，公眾對美國媒體及其做法有很大的不滿。公眾用來刻畫媒體的詞包括：剛愎自用、麻木不仁、抱有偏見、有失準確、聳人聽聞。報紙流通量不是平平，就是在下降。儘管人們的閱讀量在上升，但是他們讀的不是報紙。電視新聞的收視率也在大幅度下降。

看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新聞"出了毛病。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新聞記者是否知道如何修理？

無黨派國際基金會"自由論壇"最近就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現狀進行了一個調查。總的來說，媒體對其第一修正案權利的重視程度高於普通大眾的重視程度。

◆百分之五十三的被訪者說，他們認為媒體的自由度太大了。這比 1997 年一次類似調查中持這種看法的人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被訪者說，他們認為媒體保護民主，而在 1985 年持同樣看法的人是百分之五十四。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認為新聞實際上有損於民主。

◆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說，報紙不應該自由發行。

◆有令人不安數量的人說，不應該允許媒體支持或批評政治候選人，不應該允許使用秘密攝像機收集新聞，不應該允許出版政府機密。

我們怎麼辦？

這些調查結果對記者來說是令人不安的。我想，這些結果對普通公民來說，也令人不安。

¹作者簡·謝弗為皮尤公民新聞中心執行主任，提倡一種新的新聞報導，鞭策人們參與和介入社區生活，視社區問題為己任。皮尤中心提倡進行公民新聞嘗試，使新聞組織能夠建立和發展更好的新聞報導方式，促使人們重新參與公眾事務。<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media3commnty.htm>

我們面對這一切應該怎麼辦呢？皮尤中心的努力之一不僅僅是對問題做診斷，而是在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實際中，許多記者比較容易聽取診斷，而難於接受治療建議。但是研究結果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就連久經磨鍊的編輯們都認為情況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在我們能夠解決問題前，我們必須先弄明白我們尋求的是什麼。媒體在社區建設中的作用是什麼？

新聞報導較早的模式，特別是社區和地區報紙，常常被稱為"哈叭狗"，受出版人的控制，在公共生活中推波助瀾，向廣告商搖頭擺尾。對克林頓總統任期中一些消息的報導，以及在小肯尼迪死後攝影記者藏在肯尼迪家外的灌叢裡的景象，令媒體常常給人以"咬人狗"的形像。再就是新聞記者們喜歡大談特談的"看家狗"。社會對媒體的這一作用仍然十分看重。但是公眾對媒體的這一作用抱著越來越大的疑慮。就連記者也認為，媒體的行為常常不止於僅僅報導新聞而已。這些報導常常引起人們的爭議，有關對公眾人物的私人與道德行為的報導尤其如此。

最新的一些研究顯示，媒體看重其看家狗作用的程度超過公眾對這種作用的珍視。只有百分之十的新聞媒體相信，媒體對政治領導人的批評有礙於這些官員的工作，但是有百分之三十一的公眾認為，媒體幹預領導人履行其職責。

如今一些新的媒體模式正在經受檢驗。一是"引路狗"模式。媒體能不能不僅向公眾提供新聞和信息，而且幫助他們履行公民的職責？媒體能不能擺脫單純報導奇聞怪事的局限，鞭策人們參與和介入，視社會問題為己任？是否能夠不使人們成為觀看客、而成為參與者？

在這方面，公民新聞進行了相當多的嘗試。公民新聞不是倡導放棄媒體的監督作用，而是在這個基礎上增加更多的責任。

皮尤公民新聞中心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決定創立皮尤公民新聞中心的時候，關注的並不是新聞業，而是公民的參與和介入。信託基金擔心民主肌體受損 — 公民不投票、不做志願工作，也不積極參與公民生活。信託基金擔心，人們沒有在為解決自己社區的問題而行動起來。

人們提出一個簡單的假設：如果新聞記者做法不同，公民是否也會改變做法？我們是否可以在新聞室嘗試一些不同的工作模式，從而在保持準確、客觀、獨立和公平這些新聞報導的核心價值觀的同時，使其對公民也有一定的幫助？

公民新聞如今是一個很寬泛的標籤，指的是編輯和新聞主管力圖通過新聞工作，幫助人們克服無能為力與疏離隔膜的感覺。公民新聞的目的是向公眾介紹當前的時事和問題，進而使他們能夠就公民事務做決定，參與公民對話和行動，從總體來說，行使他們在民主社會中的職責。

公民新聞工作者相信，通過新聞報導調動人們去思考、甚至去行動，而不是單純吸引他們觀看，是有可能的。他們認為他們有責任做到這一點。

不過我要提醒的一點是，公民新聞工作者並不希望告訴讀者和觀眾怎麼想或者怎麼行動。他們僅僅是在建立一個使公民變得更有力量的中立區，用信息 — 包括用什麼方式肩負起公民責任的信息，武裝公民，提供一些解決問題的設想或辦法。

公民新聞工作者相信，可以在不抹殺看家狗作用的同時充當引路狗的角色。他們都很樂意放棄咬人狗的角色。

公民新聞可以說是回歸到優秀新聞報導的根基上，也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報導新聞的途徑。怎麼看這個問題就取決於你的立足點了。我個人相信，公民新聞比優秀新聞更進一步，至少是比我在《費城問詢報》22 年的工作時期更進一步。

公民新聞運用優秀新聞報導的所有手段，但是它無忌於更深地介入社區。它傾聽，它充當社區行動的催化劑，它幫助社區發展自身的力量。公民新聞敢於這麼說：如果老一套的新聞報導不起作用，那就讓我們來重新創造它。

什麼是新聞？

公民新聞力圖在新聞業創新的方面之一是要對新聞進行重新定義。大多數記者把新聞定義為衝突：在位人和競爭對手的衝突，勝者和敗者的衝突，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衝突等等。

公民新聞尋求擴大這一定義。它力圖超越單純報導一個事件、一次會議或者一場爭議，而是要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它既報導衝突，也報導共識；既報導失敗的故事，也報導成功的經歷。總之，公民新聞試圖報導那些也許有助於其它社區處理困難問題的消息。

公民新聞試圖想出一些新的、也許和新的管理模式更協調的報導模式。許多地方在管理上正在從以前的輸贏模式轉向一個更基於共識、對各方都有利的解決問題途徑。

新聞報導如何適應這一轉變呢？我們在報導衝突、盯梢、跟蹤誰勝誰負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派一位記者出去採訪一個會議，如果與會者意見統一，這位記者很可能會回來告訴編輯說，什麼都沒有發生，無事可寫。

公民新聞記者不但考察社區成員意見不一致的地方，也考察他們意見一致的地方。這是新意所在。

皮尤中心另一個更雄心勃勃的嘗試是 1999 年在華盛頓州的斯波坎。當時，《言論評論報》使用公民新聞這一"勘探"工具，描述年輕人生活中那些決定他們成年以後成功或坐牢的重大時刻。他們的調查發現了一些很有意味的時刻，如四年級第一天是你了解一個孩子是否會喜歡學校的日子。七年級第一天則決定你會是"怪才"還是會有好人緣。這裡面的想法不僅僅是報導這個題目，而是為社區的社會服務機構找出一些插手點。這是一個對"新聞"的全新的定義。

公民新聞在於從不同的角度去報導事件，使它們和讀者更相關。加州州《奧蘭治縣紀事報》嘗試用一種新的敘述方式來報導"汽車旅館兒童" — 也就是住在迪斯尼主題公園對面居民旅館裡那些極其貧窮的孩子。這一報導引用孩子們的原話，採用對話體裁。這篇報

導收到了強烈的反響，包括 20 萬美元的捐款，50 噸食品，8 千個玩具，另外還有不計其數的自願者拿出自己的時間，幫助這些"汽車旅館兒童"。奧蘭治縣劃拔了 100 萬美元修建住房，讓這些貧窮家庭搬離汽車旅館。一個非盈利性的機構發起了一場 500 萬美元的活動，解決這些汽車旅館家庭的吸毒問題。記者勞拉·薩裡後來說，使她驚訝不已的是，大家都共同行動了起來，尋找解決辦法。"類似的事情如果用傳統的方法報導的話，將會把矛頭指向政府機構。但是由於寫法不同，沒有人覺得他們受到了指責。所以大家不是把精力浪費在為自己辯護上，而是走上街頭，行動了起來。"

公民新聞在於重新定義平衡。記者報導一個事件的兩面，認為這就叫公正與平衡。公民新聞記者認為，這種方式其實應該被稱為兩極報導。平衡的意思是取中，而不是極端。公民新聞記者試圖保證所有受一個問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而不僅僅是那些觀點最極端、向媒體發表聲明的人。公民新聞記者不回避報導人們的認識仍然模糊不清的狀況。

最後，公民新聞在於為人們的積極參與提供一個起始點，鼓勵記者和公民之間的互相溝通與交流。它尋求與讀者之間建立一種有來有往的交談，而不是像我們在傳統的新聞業常常看到的那樣，單純記錄信息、把一堆事實交給公眾。這種相互溝通和交流可以在報紙上、在電台上、在因特網上進行，有時甚至可以在一個實實在在的地點進行，如在論壇上和社區大會上。北卡羅萊納州的《夏洛特觀察家報》在報導有關校車接送學生的一個重要問題時，從讀者的電子郵件中發現了不少好的報導建議。

1999 年，皮尤中心在新罕普什州公共電台贊助了一個網上稅收計算器。法庭命令這一免稅州征收一項資助公立學校的稅收。新罕普什州公共電台的"稅收挑戰網址"上有知識性信息、討論場所，以及一個新穎的計算欄，人們可以把他們的房屋價值、收入以及他們所居住的城鎮的名字輸入進去，計算在三種不同的稅收改革建議下他們分別需要繳稅多少。

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有針對性和具體化了的不同的新聞業，它使人們能夠在公共決策上發揮作用。皮尤中心最近又給新罕普什州公共電台提供資金，發展"水電煤氣賬單估算器"，以此使得公眾能夠更加了解和參與放鬆水電煤氣管制問題。

公民新聞的效果

那麼公民新聞到底有什麼效果呢？

對社區而言：

- 我們看到，新聞報導在保證質量的同時，能夠幫助提高社區處理問題的能力。
- 我們看到，只要你為讀者提供行動的途徑，他們將會行動起來。
- 研究顯示，公民新聞所做出的努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增加了讀者對具體問題的了解。
- 我們看到，公民新聞所做出的努力使公眾對媒體的看法出現了積極轉變。

- 我們看到，其它社區團體學習新聞機構對公民新聞的做法，採用了公民參與的模式(以學習小組和行動小組等方式)。

- 我們開始看到，由於參與公民新聞的活動，許多從未想過要擔任公職的人在競選公職。

對新聞業而言：

- 我們看到，對社區問題做出真誠響應的深度報導，而不是僅僅把一個問題的兩方面羅列一下了事。

- 我們看到，記者重新認識了他們的社區，打破了某些成見。

- 我們在新聞室看到各種各樣的創新。新增的版面、新職位、新評判標準、新的宗旨宣言，新的詞匯。諾福克的《弗吉尼亞向導報》是一份報導弗吉尼亞州州府裡奇蒙地區的報紙，這份報紙的記者在宗旨宣言中保證，要把報導州政府和選舉當成民間集思廣益、解決問題的一個園地。

- 最後，公民新聞製造了一種允許編輯不畏風險、嘗試新東西的環境。

我不認為公民新聞能夠解決媒體的所有問題。但是公民新聞的確提供了不少救助。正如《保羅書信》所告誡的那樣，我們相信我們需要"嘗試一切，並將一切好東西保持下去。"

貳、 主題文章二：公共新聞作為新聞理論²

公共新聞運動的出現，是在回應對美國政治與媒體的危機，以及對新聞工作者角色的憂慮及不滿。這項運動的核心理念，簡言之，是主張新聞媒介應該負起促進公民審議(civic deliberation)的功能。所謂民主審議，是指公民針對共同關切的議題，以其背後涉及的基本價值，透過公開、理性的溝通與辯論，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尋求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審議的概念同時隱涵了社群認同，一群人必先認識到彼此面臨共同的問題、分享交織的命運，並且接受同樣一套權利義務規範，才能參與審議過程。以若森的話來說，公共新聞要求新聞工作者：

(1)將人民視為公民，即公共事務的潛在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好奇觀眾；(2)協助政治社群採取行動，而不僅是了解本身的問題；(3)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坐視其惡化；(4)協助公共生活健全運作，以增進大眾對其關切。如果新聞工作者能設法做到這些工作，假以時日將可能恢復大眾對新聞界的信心，與正在流失的閱聽人重建連繫，重燃許多新聞工作者入行時懷抱的理想主義，並且對美國民主的健全做出更實質性的貢獻，這也是新聞工作者之所以獲得其各種特權與保障的理由。(Rosen 1999b:22)

蓮貝詩(Lambeth)也指出，公共新聞在形式上具有下列特徵：1.系統性聽取公民的意

² 摘自王興中(2002)：〈把新聞還給公民--美國『公共新聞』運動的啟示〉。

<http://www.gio.gov.tw/info/2002html/11new/wang.htm>。第十一屆傑出新聞獎考察報告。

見；2. 尋求以不同的認知框架（frame）報導社區重大議題；3. 認知框架取擇於能否刺激公民審議與了解議題；4. 主動報導重要公共問題，促進公眾了解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與不同立場背後的價值關懷；5. 持續有系統地注意與公眾溝通的成效與公信力。

（Lambeth 1998b:17）

相對於傳統的新聞成規，公共新聞的改革性就在於從「公共（the public）」的角度，重新反省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與任務。傳統新聞與公共新聞的理念分野，可以追溯到一九二〇年代，美國新聞與政治學者關於「公共」概念的辯論。這場辯論的代表人物是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兩人都是自由派政論集團「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創始成員，但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卻是針鋒相對。（Rosen 1999a:64-67）

「民意如流水！」這句新聞記者耳熟能詳的話，即可概括李普曼對主流媒體論述的影響。在他一九二二年出版的經典之作「民意（Public Opinion）」中，李普曼對公民的概念提出強烈質疑。「公共」的概念源自西方啓蒙時期，奪得政治權利的中產階級透過政治結社與輿論參與公共決策。但到了二十世紀，李普曼指出，一般大眾面對規模龐大、關係複雜的社會，多半汲汲營生而失去深入了解公共事務的能力與意願，更遑論從事嚴肅的研討與辯論。因此，人們往往僅憑片段資訊和潛意識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來論斷事物，而政治人物或政府則可輕易藉助大眾傳播而操弄民意。本身做為資深新聞記者，李普曼卻認為媒體迎合消費者的商業性質，使其不能對盲目的民意起矯正作用。李普曼甚至用「鬼影（phantom）」形容民意的不理性本質，認為依賴民意只會導向無知與暴政，因此民主政治應該強調專家政治。

以李普曼為代表的菁英民主觀點，在行為學派和經驗性民主理論的推波助瀾下，成為戰後美國的思想主流。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美國新聞工作者於是自居為揭奸發伏的「看門狗（watchdog）」，代替大眾監督政府弊端、解析菁英之間的權力遊戲，同時輕視民主政治的「主人」，與閱聽者維持灌輸資訊的單向溝通。

然而，公共新聞的鼓吹者們發現，這種悲觀的犬儒心態已經對美國的媒體生態和民主政治造成災難。正因媒體不信任讀者，讀者也日漸不信任新聞所傳達的「真相」；而媒體與政客互相利用，形成排除公民參與的政治過程，也造成人民遠離政治。而媒體這種心態與做法，最後將自斷生路，因為新聞的需求原來是建立在人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之上。正如杜威所說：「報紙必須了解其本身的健康是依賴其他許多機構的健全，這些機構把人們從個人的小世界中吸引出來。因為公共生活的吸引力愈大，對報紙的需求也就愈大。」（Rosen 1999b:20）

杜威認為，李普曼對民意的描述或許符合現實，但如果因此否定民意做為民主的理性基礎，民主本身也將失去意義。他強調，民主不只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種社會組織原理，其前提即是信任人民的能力：

每一個人都能有所貢獻，人們有能力自己做決定，只要給予機會他們就能充分了解身處的困境並思索解決之道，世界是可知的，只要我們自我學

習如何研究及討論它。（Rosen 1999b:65）

公共新聞的辯護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克睿（James W. Carey）指出，杜威所提倡的這種「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正是公共新聞運動背後的思想淵源。公民共和主義強調，「民主的根本不只是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保障，而且要讓公民能夠參與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共同透過審議尋求公善（common good）、並一起努力開創政治社群的前途。公民資格（citizenship）不僅止於權利與利益，而且涉及認同（identity）。此一認同內涵包括情感歸屬、對群體的關切、與命運共同體的道德連帶，當然，還包括對公共事務的了解。」（Carey 1999:61）杜威的觀點既是一種道德主張，也是一種因果論證。一方面，民主政治應該建立在公民的參與，因此政府必須支持並維護健全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如果失去公民社會的基礎，民主政治將淪為無政府狀態、甚至回到威權統治。

在這樣一個共和政體之中，新聞媒體的角色不應純粹屬於商業範疇，而應同時是一種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因為它是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正因如此，新聞媒體不僅受到財產權的保護，而且得到憲法上新聞自由的特殊保障。反過來說，媒體也應將讀者視為公民，而非單純消費者或持股人，以協助讀者參與公共事務為職志。

克睿並進一步指出，市場經濟主導的全球化，將個人視為「自由」但孤立的消費者，導致權力更加集中，媒體也逐漸被跨國財團掌控，營利動機取代公共服務的精神，結果很可能不是全球的民主化，而是威權主義死灰復燃。此即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曾警告的資本主義「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傾向。公共新聞的理想，正是制衡這股趨勢的努力。（Carey 1999）

公共新聞另一個理論源頭，來自德國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哲學家尤根·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就在公共新聞運動剛剛萌芽的一九八九年，哈伯馬斯的重要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英譯本也在美國出版。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繼承歐陸啟蒙運動的理想，主張「透過理性的討論與開放性的交流，同時藉助自由的新聞媒體，公民能夠集體自行決定其共同事務。」（Rosen 1999b:62）

哈伯馬斯從歷史出發，指出公共領域的原型乃是十八世紀中期英法兩地的中產階級，藉由公共討論形成民意，對抗君權神授的威權統治。當時中產階級社會中一小群人，因此容易利用政治沙龍或報紙、小冊子形成開放而平等的公共論壇。隨著公民權的擴張，和工業社會的興起，公民的範圍越來越廣，又受到商業媒體與國家宣傳機器的滲透，公共領域反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所謂「意見自由市場」。在意見自由市場中，決定意見價值的邏輯不再是理性思辯，而是以民意為包裝的權力較勁。政治意義的公民也被經濟意義的大眾（mass）所置換，一般人只能藉由投票或民調表達意見，而沒有平等機會參與公共辯論。

從公共領域理論的觀點，新聞媒體應是重建現代公共領域的最佳媒介，但媒體首先必須改變對公共事務與公民的理解。公共的議程應由公民而非菁英來界定，民意應透過開放

的辯論而非單向的問卷調查來反映，而新聞媒體的職責就在壯大公民的聲量（empower），並將本身開放做為公共論壇的空間。

公共新聞對主流新聞價值的批評，引發激烈的爭論。公共新聞最重要的主張，就是從公民的觀點報導新聞，並鼓勵公民參政，認為這種公民取向有助恢復媒體的公信力。但批評者指出，所謂媒體與民主的危機有誇大之嫌，而公共新聞的做法勢將扼殺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性，使新聞淪為意識形態的倡導（advocacy）。如果新聞工作者將新聞判斷的責任交給讀者手中，或者媒體自身投入某一主張的推動，很容易走向討好讀者或自我吹噓，而不再被視為客觀的知識提供者，最後反而將造成媒體公信力更加惡化。（Woo 2000）另有些學者則認為，公共新聞運動對社區連結性（community connection）的強調，反映出一種從個人自由主義到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典範變遷，即從強調個人的自主性，轉向強調集體的秩序與權威，他們憂慮公共新聞運動將使新聞自由受到威脅。（Merrill et al. 2001）這些批評認為，公共新聞的改革立意固然良善，但跨越客觀原則的激進做法恐將反而傷害新聞專業本身。

相反地，持左派觀點的學者卻認為公共新聞太過保守。玻利（Pauly 1999）認為，公共新聞對民主政治與新聞專業的描述根本是一種迷思。他指出，美國的民主成就其實是各種弱勢團體，例如非裔、女性、勞工不斷抗爭得來的，而新聞媒體一向是站在權威這一邊，從來不是民主改革的力量。這一點，從各種社會運動總是將媒體視為主流社會打壓的工具，即可證明。從公共新聞的實踐來看，其所偏好的「理性、平和」的公共審議，其實體現著中產階級的價值，公共新聞也未表示對社運的支持。由於公共新聞昧於歷史與結構的深層因素，例如媒體的商業本質，因此不可能扮演改革的角色。哈特（Hardt 1999）也強調，問題關鍵在於媒體的所有權，而不是單純從新聞倫理層面就能改變。他注意到公共新聞的推動者，主要來自媒體管理階層和象牙塔裡的學者，而不是基層新聞工作者，也未曾考慮新聞工作者基本的勞動條件問題。如果不去思考社經結構的改變，和媒體的商業宰制，公共新聞不過是保護媒體和社會既得利益者的新瓶舊酒。體和社會既得利益者的新瓶舊酒。

除了理論上的質疑，公共新聞的實際成效也是見仁見智。公共新聞的支持者和參與的媒體相當重視成本效益問題，也不斷從事個案研究累積經驗，許多研究顯示，大眾對公共新聞確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和接受度。公共新聞雖然內容嚴肅，但相關電視節目的社區收視率反而常有佳績，報紙方面，也不會造成發行量的負面影響。（Rosen 1999；另參見普優中心網站的報導）然而，反對者也發現，對公共新聞最強調的投票率、公民參與等指標，並未因公共新聞的努力而有顯著改善，而新聞界內部對公共新聞的做法也仍存在相當大的反彈。（Woo 2000）

綜合以上的爭辯，公共新聞運動仍有其洞見與價值。公共新聞固然未能考量資本主義的結構限制，但對於一般新聞工作者來說，公共新聞不失為一種實用可行的體制內改革途徑。畢竟我們不能要求所有新聞工作者都成為社會運動家，而公共新聞運動也未宣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不過，在從事公共新聞實踐時，對於傳統新聞原則的突破必須非常謹慎。如若森所說，雖然不客觀，但須堅守中立，所謂不客觀是指支持公民參與，而中立

則是在公共對話中不偏袒任何一種意見。公共新聞所欲強化的公共生活，當然不可能立竿見影，而需要長時間的累積，但由於公共新聞往往需耗費傳統編採外的成本，它的執行效率必須不斷檢討，否則改革恐難持續。

參、 從公共新聞看台灣的新聞改革³

雖然公共新聞運動的代言人若森一再強調，公共新聞仍然是個演進中的概念，其內涵與發展的可能性仍待從更多的實踐中慢慢累積，在這個運動剛走過第一個十年的現在，為它下定論還嫌太早，不過，從現有的經驗之中，已可歸納出公共新聞的幾個特色：

首先，公共新聞是對於當代媒體與民主政治發展困境的一種回應。受到傳播科技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新聞媒體正徘徊在十字路口，傳統的新聞規範面臨市場競爭的考驗，愈來愈難抵抗商業誘因與財團控制的威脅。同樣地，美國民主所引以為傲的公民精神，逐漸被政治疏離感沖淡，連帶影響到對新聞的信賴與需求。解決這個一體兩面的危機，公共新聞認為媒體應從旁觀走向介入，重建公民與政治和媒體的連結。

其次，公共新聞的起點在選舉新聞的改革。選舉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礎，也是公民參與的最直接管道。然而，在媒體與政治人物的短線操作下，選舉新聞流於「賽馬化」，其公共政策辯論的實質反被忽視。這種現象早已廣受詬病，而新聞工作者往往罵得大聲，卻自甘成為共犯。公共新聞則示範了選舉報導的另類可能。

第三，公共新聞特別強調社區的經營。民主的鞏固與活力必須紮根於基層社區，媒體的永續經營也不能脫離讀者日常生活。社區公共議題受制於政經利益與媒體的消極而不能解決，將使民眾厭棄公共事務，也失去對新聞媒體的信任。不過，新聞媒體介入社區所涉及的問題，遠較選舉報導複雜，必須考慮介入的適當方式與界限。

第四，公共新聞的一些個案，也涉及編採組織的改變。傳統的分線制度，本身預設了新聞的來源以政府和菁英為主，也限制了對議題的觀照角度；科層式的管理，則壓抑了新聞工作者的創意與成就感。編採組織的民主化與議題導向的分工，或許將提高決策成本、增加工作量，但可能有助於報導的深度與創意。

第五，公共新聞的理論基礎，是公民共和主義與公共領域的理念。這兩種理論都強調公共審議的重要，以及新聞媒體的角色。事實上，現代新聞媒體的出現與公共領域本來就息息相關，而媒體也經常自許做為社會的公共論壇。新聞工作者應反省所謂客觀原則與「看門狗」的角色，保持中立但主動促進公共的對話。

最後，公共新聞並非萬靈丹，其成效仍待長時間觀察，對媒體的困境也只是有限的解決方案。催生公共領域、刺激公民參與都不是一蹴可幾，但持續性的實驗需要新聞工作者的堅持與社會資源的整合，同時有賴學術單位隨時評估以找出更有效率的操作形式。此

³摘自王興中（2002）：〈把新聞還給公民--美國『公共新聞』運動的啟示〉。

<http://www.gio.gov.tw/info/2002html/11new/wang.htm>。第十一屆傑出新聞獎考察報告。

外，對於新聞媒體結構面的分析與改革，是公共新聞未能顧及的面向，而政經體制的改造，自然不可能單靠新聞工作者達成。

從台灣的角度看來，美國新聞工作者所感受的困境對我們並不陌生。媒體公共功能的貧弱，以及商業競爭的驅迫，也正是我們焦慮的問題，然而我們的回應顯得蒼白無力。目前台灣新聞改革的努力可從二方面觀察：一是由媒體外部發起，針對新聞內容的各種監看行動，以及針對媒體所有權的無線電視台公共化運動；一是各媒體內部因應商業環境變遷的自我調整。新聞評議委員會和一些社運或公益團體的監看行動，雖持續行之有年，但對媒體產生的壓力似不明顯，近來台灣廣告主協會則以廣告資源為後盾進行監督，但又可能產生外力干預新聞自由的疑慮，大體而言，這類外部改革的成效有限，而且仍必須轉化為媒體自發的反省，才能改變新聞工作者的思維。至於媒體面對經營環境惡化而做的自我調整，由於自囿於經營管理的層次，多半止於一再「改版」，和企業瘦身，而改版的思考過於保守膚淺，往往只是被動因應「八卦」媒體的挑戰，一味朝軟性、衝突、煽情方向移動，而未深入思考讀者的需要與媒體的責任。

台灣新聞界面對變局的左支右絀，或可借鏡美國新聞發展的歷史加以理解。如克睿（Carey 1999）指出，美國新聞媒體在十九世紀「黨派模式（partisan model）」到廿世紀「信託模式（trustee model）」的轉型之中，建立了以獨立客觀為民主守門的專業倫理，雖然因為民主理念差異而與公共新聞扞格，但新聞工作者對民主的承諾並無二致，同時也對任何改變形成內在的監督力量。台灣新聞界雖遭遇與美國類似的危機，卻缺少這樣的理念傳統與制衡機制。

嚴格地說，台灣新聞界仍未脫黨派模式，不但有政黨直接間接投資媒體，許多民意代表也視主持新聞節目或經營媒體為常態，媒體本身更不避諱政治立場（美國報紙嚴格區分言論與新聞，而我國報紙總是把社論放在最重要的新聞版面，可見一斑）。解嚴之後，媒體還來不及洗脫黨派干預、內化現代新聞自律的規範與機制，即已在市場競爭和跨國媒體影響下，走向市場導向的新聞（例如壹周刊、彩經和原本即耽溺的衝突取向），自然也就難以堅守新聞的公共角色與責任。

在這樣的脈絡下，引進公共新聞的觀點可說更有意義，但也必須格外謹慎。在公共媒體舉步維艱，經營環境的確相當困難之中，任何新聞內容與組織的改革不能脫離商業利潤的考量，但在媒體一片軟性化、煽情化的大潮中，公共新聞提供了一個另類思考的可能。在閱聽大眾已經受夠了血淋淋的畫面和無意義的口水戰時，新聞工作者是否能以貼近生活的深度報導與公共論壇來重塑消費品味？與其一味追逐浮面的「讀者需求」，何不嘗試與社區建立更深廣的連繫，加深讀者對媒體的信任與認同？公信力與認同感，或許正是網路或外來媒體難以競爭的優勢？

無論是否同意公共新聞的理論，美國媒體的許多創新實驗是值得參考學習的。例如最受詬病的選舉新聞，公共新聞運動已發展出成套的另類報導方式，從民調、辯論會、社區討論、到議題與政見的深入分析，其實都是媒體能力所及甚至曾經利用的工具，問題只在如何以不同視野將這些做法貫串起來，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公共論壇也是國內媒體曾經嘗試的工作，但或許可以應用到更多重大的公共議題，並且容納更廣泛的參與，給予

更大的篇幅。目前地方新聞的品質本就亟待加強，因此更是實驗公共新聞的最佳場域。諸如社區營造、災害重建、就業與經濟、WTO 衝擊的因應，乃至族群關係等等，都是新聞媒體可以善用地方記者加以經營的議題。全國新聞的分線制度、地方新聞的資源整合，則是新聞組織值得重新思考的方向。

前面提到，台灣新聞界仍存在自律不足問題，這是改革必須謹慎其事的難題。選舉新聞、公共論壇或社區介入，都是相當敏感的地帶，而我國新聞媒體又多具根深柢固的政治色彩，如果不能嚴守政治中立，媒體的介入不但無助公共對話，反而可能更加削弱以公平開放為前提的公共領域。

地方媒體的問題或許更為嚴重。美國地方媒體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報系體制的升遷系統，加上監督者的自我角色認同，地方記者往往為求向紐約、華府升遷，務求「扒糞」爭取表現，而不願紮根於社區。反之，台灣地方記者在報社內部升遷流動性較低，一方面心態消極，一方面對專業要求與認同不強，或背負（廣告）業績壓力，或著意經營人脈出路，特派員本身與地方權勢盤根錯結，甚至利益掛鉤，其問題不在與社區脫節，而在其關係之複雜與偏頗。換言之，台灣地方媒體不是中立不介入，而是早已帶著立場介入社區，問題是如何改善地方記者與社區的關連，發揮媒體的公共服務功能，博取認同。

在台灣，也許沒人會反對新聞改革，問題是怎麼改？誰來改？對新聞工作者而言，對媒體的生存與專業的尊嚴責無旁貸，應該要時時反省記者的角色與責任，但體制內的改革仍然有賴新聞媒體主事者的識見與投入。民間智庫、社運團體以及學術界等等，則是新聞改革可資援引的外部資源。媒體應該加強與新聞教育、監督機構合作，共同致力重建新聞倫理、改善新聞品質，才是永續發展之道。

對於新聞改革來說，最重要的可能正是若森提出的問題：「新聞工作者所為何事？」從事新聞工作的動機與成就感可能因人而異、不一而足，但相信多數人都是懷著一股淑世的理想與責任感而選擇新聞工作。況且，如果不是有助於弱勢者的處境，不是有助於形塑一個更良善的社會，新聞工作者憑什麼享受憲法保障與專業尊嚴？面對一九八八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惡質現象，美國新聞工作者沒有忘記這份自省，因而引發公共新聞改革運動；反觀台灣，二〇〇一年選舉的荒謬劇情，在新聞界卻是船過無痕。一個體系——不論是一個國家、一個行業、或一個報社——最可怕的問題不是固有缺陷或橫遭危機，而是對之麻木，失去自省與批判性適應的能力。美國公共新聞運動帶來最大的啟示，或許在此。

肆、 主題文章三：《生命力》重新創刊 探索公共新聞學

創刊八年的《生命力》公益新聞網正在進行一次大改版，改版幅度之大，等於是重新創刊。我們把一個中央集權的網站改為六個分進合擊部落格聯盟（測試版在此），從單純的報導新聞轉向以新聞報導、諮商轉介、架站服務並重，從「記者報導新聞給讀者看」改為「記者和讀者共同報導新聞」，從採寫新聞轉向匯集和編輯訊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網站系統的轉換、組織分工的調整，更是對新聞定義、媒體角色的再思考；我們所

做的，可以說是把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又稱 civic journalism）引進部落格的實驗。

公共新聞學是一九九〇年代在美國出現的新聞改革運動。它要求新聞工作者：1.將人民視為公民，即公共事務的潛在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好奇觀眾；2.協助人民採取行動，而不僅是了解本身的問題；3.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坐視其惡化；4.協助公共生活健全運作，以增進大眾對其關切。它因此要求新聞報導必須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探索解決問題的策略，同時努力讓所有受一個問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並且鼓勵記者和公民之間建立一種有來有往的對話。

《生命力》八年來的努力，大致符合公共新聞學的精神（參考大學實習報的服務與學習），這回的改版希望從新聞定義、編採運作、媒體定位等面向，進一步探索公共新聞學在部落格時代、在 NPO 領域的實踐策略。

在新聞定義方面，《生命力》八年來一貫強調重要性、實用性和啟發性。重要性是指影響相當多弱勢者或奉獻者權益，或能影響相當多社會大眾的公益思想和行動；實用性是指幫助社會瞭解和解決弱勢者問題，幫助奉獻者推動工作；啟發性是指彰顯人性尊嚴或人道關懷，能引導人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故事。這與公共新聞學強調傳遞知識、探索對策、促成改革的精神一致。未來，我們將延續這樣的精神，並將報導對象從弱勢者、奉獻者擴及改革者和創新者。我們沒把握能夠寫好每一篇稿子，但保證會全力以赴。

在編採運作上，公共新聞學常見的報導模式是：先透過民調瞭解民眾關心的議題，然後對議題進行深入的報導，再舉行討論會，持續報導行動過程與結果，同時調整採訪路線，從以採訪對象（如國會、警局）為主改為以議題（如婦幼、教育）為主。《生命力》這回改版的重點就是將過去雜亂的路線依議題重組成社會福利、社會運動、服務學習、媒體改造、文化產業五大領域，然後由主編和記者研讀所屬領域相關研究報告、分析既有報導，找出大眾媒體忽略而又值得報導的題材，進行持續報導，同時協助 NPO 架站發聲、透過部落格串連和網路討論區建立對話機制，並將求助者轉介給適當的 NPO 團體，助其解決問題。與公共新聞學的常見作法相比，我們雖以理論分析代替民調、以網路對話代替討論會，但核心精神並無二致。

在媒體定位上，傳統大眾媒體一對多單向傳播，公共新聞學則強調雙向交流，《生命力》則將藉助部落格的民主特質，進行多向對話。首先，我們鼓勵公眾自行發聲，因此將開放讀者投稿，並逐年提高投稿比例（為此，我們正在研發記者與讀者共通的寫作模式）；其次，我們將擔任 NPO 的 ISP，免費幫助 NPO 架站，從「為弱勢者發聲」轉向「協助弱勢者自行發聲」；第三，我們將藉由 RSS 串連，讓社會福利、社會運動、服務學習、媒體改造、文化產業相關網站串連成一個網路社群，彼此交流訊息、協調行動；第四，我們也將以 PHPBB 系統開闢各種議題的討論區，讓 NPO 能夠更有系統的對話。

我們希望公共新聞學的探索，能夠走出一條有別於黨派新聞、商業媒體的報導新路。讓新聞能夠真正幫助讀者覺察危險與機會、學習經驗與智慧、做好決策和行動；讓新聞記者能夠擺脫「文化流氓」污名，成為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識份子。